【信口开河】

心灵的敞开与收缩

□朱建信

敞开与收缩，两种心灵状态，哪一种能使人获得更博大因而也更有力量的未来?

八月,因有一个建军节而容易让人想到军人和与军人、军队相关的文化问题。在世界早已敞开的时代,从不同文化的相互“照见”中,或许能找到一些对我们实现强国梦不无裨益的东西。

一战临近尾声的1918年4月21日,因把飞机涂成红色而被称为“红男爵”的德军上尉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奇特霍芬,在击落协约国80架飞机后于索姆河上空被对手击落,协约国士兵纷纷拣拾“红男爵”的飞机碎片,以作纪念。里奇特霍芬,一战空中战场上的战神,仿佛一个神话、一个死亡符号,是协约国飞行员心里的一片恐怖阴影,也是他们心里的大英雄。里奇特霍芬死后,由英国军人牵头组织,神职人员在战地为年仅25岁的“伟大敌人”主持了隆重的葬礼:与里奇特霍芬军衔相等的6名协约国上尉军官,抬着里奇特霍芬的棺椁走进鲜花环饰的墓地,将棺椁送入墓穴后,列队整齐的士兵同时对天鸣枪,向英法俄等多国军人的共同敌人表达最高的敬意。

如此礼遇敌人,放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环境里,一定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伟大”这个词就绝对不会给敌人使用。击落了协约国80架飞机,其中除少数飞行员成功跳伞逃生外,大多数飞行员无生还可能,这样“凶残”的敌人还给他买棺材、墓地布置鲜花、鸣枪致敬?最大的可能是用机枪往敌人尸体上狂扫、扎刺刀,再吐一阵唾沫,“给兄弟们报仇啦”!若是古代,除了暴尸、碎尸万段,也不排除“分啖贼肉”的可能性(袁崇焕不是外贼,而是忠于国家的大将军,只是被疑为内鬼,还“万人争食”呢)。战争中两军对垒,在胜负已见分晓的情况下,一方对待另一方的态度——胜方尊重负方还是蔑视负方,负方仇视胜方还是尊重胜方,是各自所属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特质或性格的反映,这种特质或性格中,蕴含着两个向度的价值和精神以及由此带来或产生的整体性趋强与趋弱的内在力量。

倘若以国家为单位,问“中国最恨谁”,读小学的孩子都能给出正确答案。近代以来,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是日本,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机器在中国制造过各种各样的灾难。然而那些灾难的制造者亦即日本军人,在战场上也有尊敬对手的习惯。1940年2月23日,曾一度让关东军和“满洲国”头疼的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殉国(系被叛徒射杀),伪满通化省警务厅长、日军大佐岸谷隆一郎说:“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杨靖宇。”在将中国英雄的头颅割下送关东军司令部邀功的同时,日军大佐命人用上好木材雕一“木首”与杨靖宇躯体“合体”装入棺椁,搭建灵棚,于同年3月5日亲自主持了庄严的葬仪,焚香供酒,请日本僧人做过法事后入土安葬,坟前立一木碑,请当地中国书法家写了“伪司令杨靖宇之墓”碑面铭文,碑背书一行小字:岸谷隆一郎——康德七年三月五日立。淞沪抗战中“中国无被俘空军”的故事,据说在日本比在中国流传还广。阎海文驾机到日军阵地上空执行轰炸任务,飞机中弹跳伞后落入日军阵地,日军实施合围要“捉活的”,阎海文用手枪连毙数名日本兵,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日军举行了“慰灵祭”,就近掘墓安葬了阎海文,墓前立碑,碑文是“支那空军勇士之墓”,此事当时不止一家日本媒体报道过。张自忠上将战死前线后,“日军列队脱帽,行礼致敬,棺木盛殓”,立“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后来第五战区奉命将张自忠的灵柩沿长江运往重庆,日军获得了情报,下令“空军停止空袭一日”,以免炸弹伤及“支那大将军忠骸”。

不仅是在中国战场上,在日本国内也有中国勇士的墓碑,且立碑的时间更早。距大阪不远的真田山陆军墓地,就葬着刘汉中、李金福等6名清朝中国军人,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中受伤被俘后死在日本的,和死去的日本军人葬在同一墓地,墓碑上名字前冠有“清国”二字,其中刘汉中的墓碑上,名字一侧还刻有“清军马队五品顶戴”的铭文,刘是甲午战争中受伤被俘死在日本的官职最高的清朝军官。这些中国官兵的墓碑与日军官兵的墓碑形制完全相同,都是日本文化中的“勇士碑”——方尖碑。

日本军人尊敬中国英雄,为他们的“敌人”置墓立碑,躬身行礼,在我们一些书籍报刊、宣传资料中一般使用的文字是“连凶残的鬼子也不得不低下了头”,在少儿读物中则很可能是“鬼子怕×××从阴间回来找他们报仇”。汉语文字具有良好的导向性和暗示性功能,上述具有明显的单一导向性的“描述”和“评价”的后果,是使感性代替理性甚至根本没有理性的读者和孩子不知道敌人也可以是学习的对象,不知道“敌人”忠于国家、无私无畏的精神,哪个国家的人都应该学习。“不得不低下了头”,把敌人对中国英雄的敬意给屏蔽了;“怕……报仇”的意思是“敌人怕”,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人人尊敬,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文字透出的信息,除了仇恨,如果说读者还能收获什么,就是跟在后面的那句“勿忘国耻”的告诫,而“被告诫”产生的意义和自己主动悟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后者比前者更能帮助人将内心向更辽阔的维度敞开,吸纳更多的阳光,而不是向更狭窄的方向收缩。敞开与收缩,两种心灵状态,哪一种能使人获得更博大因而也更有力量的未来?

(本文作者为军旅作家)

【域外走笔】

世界的尽头——乌斯怀亚

这个遗世独立的小城,据说只有六万人。一下飞机你就会感到她的清冷和肃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极地的冰雪气息,一切仿佛都为南极而预备。

南极论坛是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人民日报香港分社发起,联合国内外二十多家相关机构和新闻媒体,共同组成的非政府话语平台。它的宗旨是:“思考人类文明,关注地球环境,推进均衡发展,实现共同价值。”本次南极行活动是该论坛自成立以来举办的探讨文明走势、发挥全球影响力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国内外前政要、知名企业高管、艺术家、科学家、作家、思想家、宗教界人士,共165人参与,分三组五团分别从北京、上海、香港出发,飞往阿根廷,然后再由阿根廷前往南极。我被编在C组三团,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LH721航班,于北京时间11:30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宿一夜,第二天凌晨起床,飞往阿根廷的南部城市乌斯怀亚。这是我们在陆地上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丽的一站。几小时后,我们将登上邮轮,前往无人居住的大陆——南极洲。乌斯怀亚,这个依山傍海的城市,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3200公里,而离南极洲只有1000公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成为通往南极的天然门户。因而,又被称为“世界的尽头”。

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总共待了只有七小时,但这七小时我相信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咀嚼、回味。她的幽深,她的静穆,她与世无争的慢节奏,都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我想,上帝把我这样一个出生在北半球的乡巴佬扔到地球的南端,就是让我体会造物的神奇和静美。

这个遗世独立的小城,据说只有六万人。一下飞机你就会感到她的清冷和肃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极地的冰雪气息,一切仿佛都为南极而预备。她的机场就建在一个半圆形的海湾上,整个航站楼是一座用木架搭起来的拱形建筑,看上去像一个放大了的小木屋。出了机场,但见湛蓝的海水在眼前荡漾,抬眼处是安第斯山脉的皑皑白雪在蓝天下闪光。

街上到处都是“The end of the world”的牌子,到处都是红黄蓝各异的木头房子,木屋上涂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图案,令人疑心里面都住着白雪公主。街道不宽,但依山就坡,顺势而下,直至海边。海水碧蓝,蓝天白云之下,则停靠着来自世界各地驶往南极的邮轮。据说,这里驻着一个执行联合国《南极条约》的组织,为保护南极脆弱的生态,定时监督,以保证每天只能有一艘邮轮出港。

站在海边,抬眼望天,但见安第斯山脉的雪峰如天神耸立,白衣素盔,战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雪线把两种景致截然分开:雪线以上是积雪的山岩,黑白相间中透出一种威严;雪线以下,是葱郁的森林,墨绿映衬下显得格外幽深。森林以下直至海边,则是鳞次栉比、争奇斗艳的木屋子。一群本地的孩子在海边的草地上踢球,背上还背着书包,这技艺可是他们的“国粹”。草地上隔不远就放置几把藤椅,老人、妇女和孩子坐在上面闲聊。一对年轻人搂抱在藤椅上,椅下是两双无关紧要的鞋。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

离城不远处就是那座著名的灯塔。这座灯塔因为矗立在世界的最南而使多少浪子逐梦而来,又迷途知返。王家卫的电影《春光乍泄》中,这座灯塔成了台北流浪青年张震的指南针。他曾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但当真的有一天来到这座塔下时,他却说:“到了尽头,我想回家。”灯红酒绿,海水泛蓝,塔影绰绰,渔舟唱晚,没有指示方向,反而诉说迷离。灯塔成了梦醒的标志。

多少人把这里作为旅行的最后一站,来到天尽头就该回家。这里成了乡愁的终点。在一个插满阿根廷国旗的小邮局,给家人、朋友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加盖一枚印有“世界尽头邮政”的小邮戳,而后就铩羽而返。但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是把她作为一个中转站、补给点,吃上两只这里特有的蜘蛛蟹,而后一路向南,直到地球的尽头。听说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买上一张打折机票,来到乌斯怀亚,租一个小旅馆住下,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月,每天上网关注去南极的船票,常常能在开船的最后一刻拿到三四千元一张的超低价船票。那种兴奋、喜乐,只有“泰坦尼克号”上的杰克了解。

我老了,没有更多的时间等待。拜上帝所赐,让我省去船资。我没有理由踟蹰。过几小时,我的船就要开了,一路向南,直到地球的尽头。

(本文作者为独立作家,著有《一头自由主义的鹿》)

【人生随想】

恼人的项目基金

□文双春

一早收到一位在国内某高校当老师的女同学的短信,说是她今年申请的基金项目没上会,又挂了。老文知道,女同学对今年的申请项目一直是望眼欲穿、望穿秋水,因为她在申请本子上下了太多工夫,费了太多心血,她甚至像喜儿那样,年都没过好,成了白毛女。女同学把“噩耗”第一时间告诉老文,想来可能是她今年请老文诊断过本子,结论是:写得非常好,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她也许没有想到,老文其实是庸医,对每一位请他看本子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怎么安慰女同学呢?老文突然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篇老外写的心理学文章,说是用诸如“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振作起来”等振奋人心的话语安慰失意者,是最常用但也是最愚蠢的在失意者伤口上撒盐的做法。按这老外建议的方法,老文应该帮女同学骂评委有眼不识泰山,骂这世道太不公平,这样女同学心里可能就会好受一点。但老文没有这么做,因为老文突然又想起了自己也老做评委。老文给女同学回短信:生活不只是拿基金,且活且自在。

女同学回复:是呀,但学校对我们有要求的,每年因为这老受折腾,上会都很难呀!

老文继续安慰:努力了就好!

女同学又回复:是呀,总要有事忙着呗,准备带孩子旅游去了。

女同学终于回到老文一贯倡导的精神胜利上来了,老文这就放心了。老文乘胜前进,继续传递精神胜利:培养孩子,是最大的科研项目;把孩子培养成才,是最好的科研成果。作为老师,你如果还在像培养孩子那样培养学生,那么你手头本身就不缺科研项目。女同学再没有回复,估计她已获得胜利。

前几天有老师考验老文:如果某位老师没有拿到任何科研项目但做出了很好的科研成果,该不该通过学校的考核,能不能当教授?老文说,在现有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下,没有项目资助的科研成果被看做“私生子”,这是很滑稽的。不拿经费做科研,这样的雷锋竟然活不了;少拿经费做科研,这样的雷锋竟然活不长,这与我们一贯倡导的价值观其实也是相悖的。科学研究固然是大学的职能之一,但对一位大学老师来说,合格不合格,关键不在于他拿不拿到项目,而在于他在不在做研究,并把这种研究转化到了人才培养上。

就老文所感所知,大学老师从当大学老师的那一天起,自始至终最焦灼的,是科研项目,因为那是一位大学老师最不能自己掌控的东西,却恰恰又是大学考核和评价老师的最致命利器。在这种最致命利器下,今天的大学老师像极了穷困农村的年轻父母,后者是生活所迫远离家乡让子女成了留守儿童,而前者则是抛弃学生或心不在学生而一门心思跑项目、搞经费去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两者显然都是极度的得不偿失。

生活不只是拿基金,但若干大学老师恰恰只因基金而烦恼。大学的一切努力应该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正如培养子女,富父母并不见得比穷父母更拿手、更有效。在老文看来,一位大学老师,只要聚力学问、凝心学生,他就是一位响当当的好老师,至于项目或经费,那应该是一种自然回报,无论对学校还是对老师来说,都可看做“身外之物”。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